

2022年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考古发现与收获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南辛家庄子和安家尧王村，其地处鲁东南低山丘陵向滨海平地的过渡地带。现东距黄海4.5公里，南、北、西三面环山，东向海洋。遗址分布范围南北长2千米，东西宽1.9千米，面积近400万平方米。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照市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涉建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本次发掘主要区域为覆盖大棚的墙基占压部分，共布TG1—TG4四条探沟，发掘面积约420平方米。

发掘区由于取土、平整土地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层堆积普遍较薄，一般厚在0.3~1.2米，地层堆积相对比较简单，大致可分为四层：第①层，厚10~35厘米。深灰色，土质较硬，主要由耕土和建筑垃圾构成。第②层，厚5~40厘米。深褐色，土质稍硬，夹有大量粗砂及少量陶片。第③层，厚0~40厘米。深灰色，土质较致密，夹有少量陶片。第④层，厚10~30厘米。浅褐色，土质较硬，结构较致密，夹有大量粗砂。④层下为生土。红褐色，土质坚硬，结构致密，夹有少量粗砂。多数遗迹开口于④层下。

本次发掘共揭露墓葬6座、房址8座、灰坑31座、水井2口，时代涵盖大汶口晚期、龙山、汉三个时期，以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为主。

墓葬保存完好者仅有3座(M143、M145、M146，其余为儿童墓或破坏严重)，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一致，为黄褐花土，土质较软，结构较致密，个别夹有陶片。墓扩长2.5~2.7米，宽0.5~1.1米，深0.6~0.8米。方向100°~106°。葬具为单棺，棺四周有二层台，墓内埋有一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南。随葬品多寡不均，有5~13件，以陶器为主，器物组合有罐、鼎、壶、豆、盆等，个别有鬲、高柄杯或猪下颌骨。根据放置位置不同，可将随葬品分为两类，一类为高柄杯或小罐，放于棺内，置于人骨旁或压于人骨下；另一类位于脚下及二层台上，主要为罐、盆、鬲等。房址有柱洞式、柱坑式、基槽式三种，柱洞式房子分布较普遍，典型的有F90、F91，洞径普遍较小，一般为25~35厘米，深20~30厘米，面积不足10平方米，室内灶、居住面等已不存在。柱坑式房址发现较多，其建筑方式是先挖一较大的坑，

底部再挖多个小的柱洞，然后立柱、起墙，一个柱坑内一般有2~4个柱洞。典型房址有F95、F96，房子长宽各约3米，室内面积较小。基槽式房址发现较多，典型的有F92、F93、F89等，建筑方式是先挖基槽，再挖柱坑或柱洞，最后立柱、起墙。基槽底部往往有两排小的柱洞，有的为柱坑的形式。F92基槽宽约1.1米，填土较硬，似经夯打，从剖面观察系由两期基槽组成：早期为典型的基槽式房址，晚期在早期基槽的基础上向内收缩，基槽变宽，改为柱洞式房址，洞内填有大量红烧土块。F92规模较大，保存完好，是尧王城遗址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中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房址，意义重大。

灰坑分布较普遍，平面形状以椭圆形为主，弧壁、圆底或近平底。坑内出土遗物普遍较少，主要为陶片，几无可复原者。H932较特殊，坑内埋有紧邻的一大一小两具人骨，成人头向南，侧身屈肢，儿童位于成年人右侧，可能为母子合葬。坑葬的发现 在尧王城遗址尚属首次，其葬式、形制与常规墓葬明显不同。

发现的井均属汉代，口径2米左右，深达3米，出有较多陶片、瓦片等。

本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可分为陶、石器两类。以陶器为主，器类较丰富，主要有大汶口文化大口尊、袋足鬲、罐形小鼎、高圈足豆、折沿罐、高领壶、敛口盆等。统计表明，陶质可分为泥质、夹砂两类，流行夹砂陶，占比达75%以上；陶色以黑陶为主，其次为灰陶、褐陶，还有少量黑皮陶、红陶等；器表盛行素面，有纹饰者多见篮纹，其他纹饰较少见。石器器类较少，主要有铤、刀、斧等。

本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尧王城遗址该时期墓葬的特征、形制、规模及器物组合，初步了解了墓地的分布情况；基槽式大房子的揭露填补了以往的空白，丰富了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晚期的房址材料，对理解和认识当时的房屋形制、建筑技术、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掘深化了对尧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认知，为该遗址的聚落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下一步的研究课题指明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李明 黄超)

河北灵寿西木佛商周遗址考古收获——发现商代晚期车马坑



西木佛墓地位于河北石家庄市灵寿县三圣院乡西木佛村内。墓地处于滹沱河沿岸，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地貌原为高丘，后因村民取土逐步削平，现地表主要为西木佛村村民自留菜地。现存范围南北长110米，东西150米，总面积16500平方米。经调查表明，这里是商周时期的遗址。1978年出土有商周时期陶器、罐、豆、青铜器有爵、鬲、戈、矛、铃等。根据这批文物揭示出的遗存面貌及特征，初步判定西木佛墓地为商末周初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地，其时空、内涵与晚商至西周时期历史密切相关，自此该墓地便为学术界高度重视。

考古发掘与收获 2021年5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西木佛墓地进行调查、勘探工作。考古勘探面积13万平方米，发现墓葬、灰坑等遗址20余处。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灵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建联合考古队，对西木佛墓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本年度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发现晚商西周时期及唐宋时期遗迹100余处，主要文化遗存可分为墓葬遗存、祭祀遗存、生活遗存三类。遗址所在台地高于地表3米，由于多年取土，现已与周围地面基本齐平，文化层破坏殆尽，遗迹均开口于耕土层下。

商周时期墓葬遗存发现20余座，均为竖穴土坑墓，除零星分布于发掘区东侧的几座外，其余均位于发掘区中部偏西，形成一处集中的墓地。墓葬方向相对一致，多为北向，随葬陶器以鬲、簋、罐为主，多见殉狗、二层台。位于墓地东部的M7是一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墓室上口长5.2米，宽3.1~3.3米，残深5.5米，墓道位于墓室南侧，上口长6.75米，宽1.9米。虽盗扰严重，仍出土较多铜器残片以及玉器，并发现有殉人，位于M7西、北侧的三座墓葬，等级相对较高，出土有玉器、铜器残片。其余墓葬多随葬陶器、海贝，或无随葬品。墓葬时代跨越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其中西周墓葬主要位于墓地南部。在墓地东南侧4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座，坑内停放车1、

马2、殉人1，车马均多使用青铜构件，形制与郭家寨M52相近。时代属殷墟四期，推测车马坑可能与M7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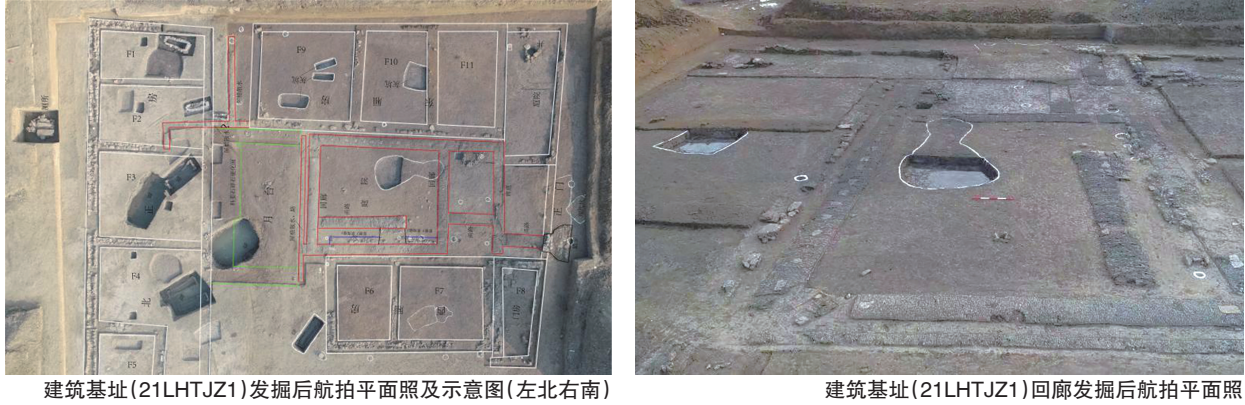
祭祀遗存主要位于发掘区西部，均为殉牲坑。埋放动物种类均为家养动物，以牛、马、羊为主。其中以单一动物种类全性埋葬为主，也有部分牲体如牛头、猪下颌骨。既有幼牲，也有成年牲体。殉牲坑形态各异，呈南北向狭长分布，与灰坑相交错，且有互相打破的现象。其分布亦遵循一定规律，相同殉牲种类的坑分布相对集中。

生活遗存主要包括灰坑、水井两类。灰坑共发现80处，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东、西两侧，多呈不规则椭圆形，少量规整的长方形灰坑可能是窖穴，部分规整的圆形灰坑底部发现有陶甗，但未发现脚踏面、柱洞、灶址，性质有待探究。灰坑时代跨越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J2位于发掘区南侧，口部呈圆角方形，边长4.35米，至6.1米深处出现方形井框，井框为木质，以榫卯结构拼合而成，边长1.8米，井框四周形成二层台，自二层台至井底深5.5米。J2底部发现大量完整陶器，器型包括罐、鬲、罍等，此外还发现有铜刀、木桶及较多的骨簪，J2出土器物多属殷墟三期。

价值与认识 西木佛遗址是近年来太行山东麓滹沱河流域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遗址墓地排列有序，高等级墓葬分布相对集中，其中的“甲”字形大墓是河北省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同时期商代墓葬，而车马坑在河北地区更是首次发现。西木佛遗址出土陶器则显示出了本地文化面貌的复杂性，晚商遗存中既有典型的殷墟风格器物，也有富含本地特色的器物，同时还有北方风格的器物。西周遗存中则呈现出商式器物与周式器物并存的局面。由墓地和遗址共同组成的这一聚落，是晚商时期商王朝在河北地区的一处重要据点。西木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探讨太行山东麓晚商至西周时期文化演进轨迹提供了丰富材料，是对滹沱河流域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补充。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灵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执笔：李鹏为 张瑞亮 雷亮)

江苏连云港海州发现唐代大型建筑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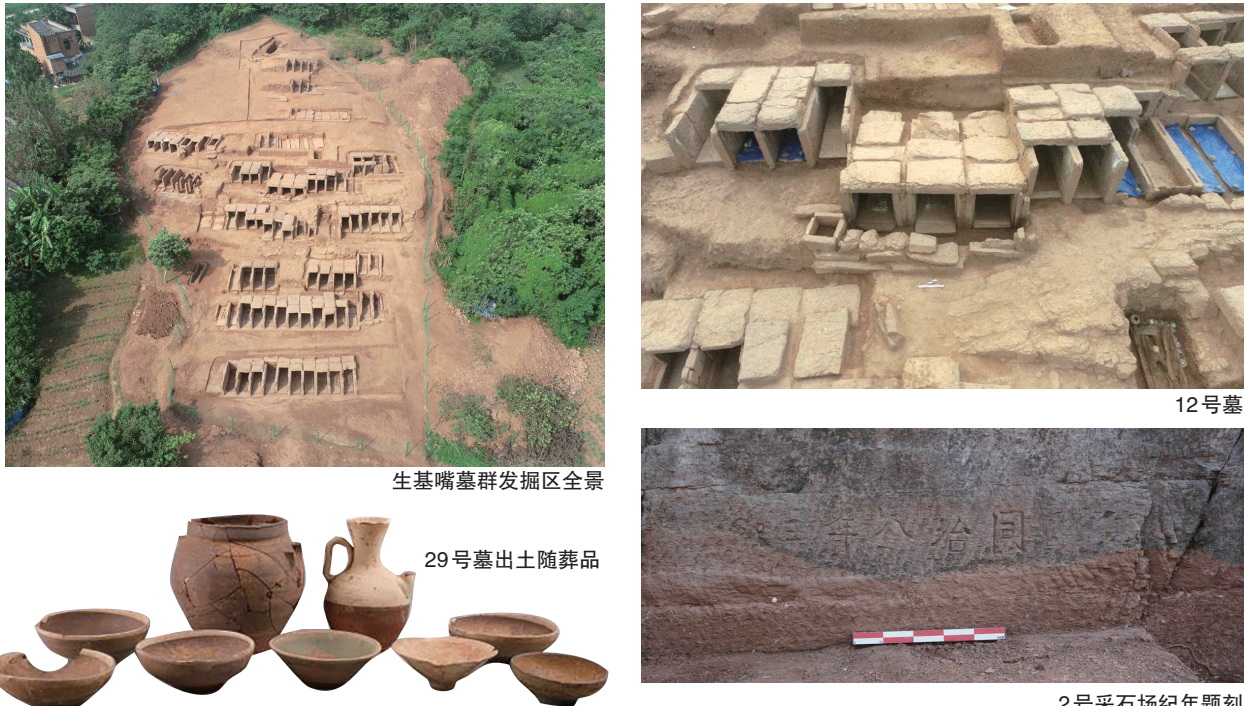


地理位置 2021年9月至12月，为配合海州体育馆二期项目基本建设，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连云港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项目地块内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配合性考古发掘工作。该发掘项目东侧紧邻孔望山，西距明清海州古城5.2公里。项目总发掘面积约21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魏晋南北朝至清代墓葬44座，唐宋时期建筑基址2处，并3口，灰坑19座，灰沟2处。出土各类文物及标本共计260件(套)。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1处大型唐代建筑基址，保存较好，为连云港地区首次发现，具有较大的历史研究和展示价值。

建筑基址(21LHTJZ1)平面布局与出土遗物 该唐代建筑基址位于发掘区中部偏西南，开口于第③层下，建于第④层上，其平面呈长方形，门向189°，东西最宽处31.6、南北最宽处46.7米，占地面积1475.72平方米。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遗迹显示，该建筑基址为一处坐北朝南的两进院落，自南向北共保留有21个遗迹单位，包括踏步、门道、庭院、水井、甬路、回廊、月台、散水、柱洞、厕所、门房1间、东西厢房5间、北正房5间。

该建筑基址四围墙基以石砌墙基为主，北正房、西厢房保存较好，东厢房保存较差。甬路和回廊保存较好，造型规整，采用瓦片铺成，顶面龟背形，中间较两侧高出，宽92厘米。其铺设方法为：竖向立瓦包边，中间横向错缝立瓦，部分间隔石块点缀。南正门位于南基槽中部，门前有一层硬化面掺杂料姜石，中部偏西残存有瓦石混合砌成的踏步。北正房平面呈长方形，保存较好，由墙基槽、石墙基、柱洞、门道组成。东西长31.6、南北宽9.7米，占地面积为306.52平方米。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内有南北纵向石墙基隔墙4列。北正

重庆璧山区生基嘴墓群考古发掘取得新收获



生基嘴墓群位于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双龙村二社，背依山脊，前有护丘，左右两侧有两条小溪由西向东流经山咀前端汇合，形成“二龙”夹护的形势。2020年7月至8月，为配合西部(重庆)科技创新小镇工程建设项目，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调查时发现该墓群，随后的勘探过程中初步理清了墓群的保存状况、分布范围、时代内涵、形制结构等。2022年6月至1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生基嘴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宋代、明代、清代及近现代不同时期的房址、墓葬、采石场等各类遗迹37处，出土各类遗物164件(套)。

主要遗迹 生基嘴墓群清理遗迹37处，包含房址1座，墓葬34座，采石场2处。其中宋代墓葬2座、明代墓葬28座，清代墓葬1座，近现代墓葬3座。

宋代墓葬：宋代墓葬发现2座，以29号墓为例。竖穴土坑石室墓，单室，方向277°。墓室内长1.64、宽0.7、残高0.86米。人骨有火烧痕迹，且摆放凌乱，局部可见明显的堆积现象，应为二次迁葬的火葬墓。随葬器物以壶、罐、盏为组合，并有少量铜、铁钱币。

明代遗迹：明代遗迹主要是房址和墓葬两类，房址发现1座，保存较差，仅残存房址后部一段，房址结构、尺寸不明。墓葬发现28座，均为竖穴土坑石室墓，有单室、双室和并列多室几类。墓室顶部有藻井顶和平顶两类，部分墓室设有左右侧龛和后龛，部分墓葬墓室由条石叠砌而成，不见侧龛和后龛。封门样式包括整石、对开门两类，以对开门为主。封门有单层门、双重门和三重门几类，多见单层封门，个别墓葬墓门两侧还设有八字挡墙。部分墓室封门外还见“一”字型封门墙，如M10、M11、M12、M21、M22。多数墓葬封门墙保存较差。另外，部分墓葬出现了“包边”现象，应是明代晚期并列多室的石室墓向清代早期石围土冢墓过渡的特征。葬式、葬具方面，部分墓葬墓室内有木棺残留，显示以木棺为葬具。每个墓室均为单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个别墓葬在棺床板上平铺一层厚约3~5厘米的白灰，起到防潮作用。

清代墓葬：清代遗迹发现有竖穴土坑墓1座，单室，以

房内部各房间面积大小不同，似存在不同功能用途区分。其中最东侧两间面积较小，最中间面积最大，西北角有区隔一方形独立小间和过道走廊。在该建筑基址内未发现砖铺面现象，出土较多碎砖瓦、陶瓷片，可辨器形有陶插座、莲瓣纹瓦当、板瓦、筒瓦、瓷碗、瓷钵、陶罐等，另外发现8枚“开元通宝”铜钱。

建筑基址(21LHTJZ1)年代及性质用途的初步认识 此次发掘的建筑基址均未发现带有明确纪年的遗物，因此只能依据其形制、出土器物特征及层位打破关系来初步推断年代。此外，结合连云港历年同时期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及历史文献的梳理，也可以对建筑基址的年代、性质判断提供相关线索。首先，该建筑基址北中部被8座晚唐墓葬(M24~M29、M35、M36)、11座唐代灰坑所打破，同时该建筑基址叠压打破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M42，故该建筑基址年代上限为魏晋南北朝，下限至晚唐；其次，建筑基址北正房、门房、回廊多处出土的陶插座、瓷碗、瓷钵、陶罐、“开元通宝”铜钱等器物，具有典型唐代器物风格，同时部分器物与连云港唐代封土石室墓的出土器物一致；最后，唐朝时期日本“请益僧”圆仁巡礼求法时曾三次经海州，其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载：“八日，押衙及僧等斋后出王录事宅，向舶处，押衙道：‘此县是东岸，州在西岸……’从此小海，西岸有海龙王庙’，未时，到海龙王庙。”此处提到的海龙王庙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与此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地望及存续时间基本相符。据此，我们推测该建筑基址的兴建年代大致为盛唐、中唐时期，废弃年代大致为晚唐五代时期，其性质用途可能为衙署或庙宇类建筑。(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执笔：杜平 陈渊明 朱良赛)

木棺为葬具，墓扩长2.84、宽1.20、深0.4~1.00米。随葬品以罐、青花瓷碗、瓷碟等为主。

采石场：采石场发现2处，位于墓群正前方山包两侧，距离墓群中心的直线距离分别为70、92米。1号采石场残长16.9、高1.2~3.65米。沿山体基岩开凿，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70年代仍在开凿，早期开凿痕迹已被破坏殆尽。2号采石场长14.62、高3.18米。近现代扰动不大，开凿立面风化严重，在其下部两个立面分别题刻“同治八年王□□”和“同治八年□□□”。2号采石场试掘出土3块残石板，厚度与墓室封门相当，其中1块石板侧面可见3条凿痕。

遗物 通过考古发掘共出土瓷器、铁器、铜钱等各类小件器物标本164件(套)。

收获认识 生基嘴墓群从北宋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对研究重庆璧山区宋代至近现代丧葬习俗及墓葬形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地区北宋火葬墓发现相对较少，本次发现的29号墓出土有“天圣元宝”等在内的丰富随葬品，为重庆地区北宋墓葬的分期及器物断代提供明确的依据。明代墓葬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重点，大量聚族而葬的家族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家族墓群的内部结构、墓葬布局方式及其反映的当时的社会丧葬习俗提供了科学的支撑。在M10~5室内发现的谷仓罐内保存有形态完整的稻谷遗存，这是继璧山广谱生基嘴墓葬后重庆地区明代墓葬考古中稻谷遗存的再次发现。M9~4室出土的阳燧是重庆地区目前已知考古材料的首次发现，拓展了阳燧的地理分布空间，这一发现对于认识青铜阳燧的制造工艺、使用功能、民间信仰等具有重要意义。采石场的发现应是渝西地区墓葬考古的首次发现，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的墓葬营造策略，为研究渝西地区明清时期墓葬营造过程、石材开凿技术提供了新的案例。清代墓葬发现1座，但是随葬品十分丰富，主要有青花瓷碗、碟和素面罐等，以青花瓷碗为主，且多不完整，可能是这一时期丧葬习俗特例。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高磊 杨慷 郎莉)